姚雪垠构想中的《天京悲剧》

□阎浩岗

作为中国当代长篇历史小说的奠基者和代表性人物，姚雪垠在创作《李自成》的同时，也在构思着另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即以太平天国起义为题材的《天京悲剧》。在其生前发表的文章、书信及访谈中，他多次提到这部《天京悲剧》，读者也从中知晓作者已搜集了一些相关资料，作了写作的前期准备工作，但大都以为这部小说不过只是作者的一个动念、一个书名而已。现有已出版发表的各种文字（包括22卷本《姚雪垠书系》和20卷本《姚雪垠文集》）中，均不见关于《天京悲剧》内容的踪影。其实，早在1961年，即《李自成》第一卷初稿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姚雪垠即已写出了57000字的《天京悲剧》上卷内容概要。写好后，他将文稿交给忘年好友周勃保存。“文革”开始，为安全起见，周勃将其交给母亲保存。1975年底，姚雪垠离开武汉去北京长住前，向周勃索要。细心的周勃让在自己任教学校进修的几名教师帮助抄写了一份复本，而将原稿交还姚雪垠。后来原稿因故遗失，周勃保存的复本也因多次搬家而“失踪”。直到2018年4月18日，周勃在整理藏书时偶然发现了这份抄本，后将其交给作者之子姚海天先生。姚海天携抄本返京后，立即亲自录入全文存档，以防保存不善，抄本再度意外遗失。这也是姚海天和友人两年来为编纂《姚雪垠全集》搜集轶文的最大收获。

近日，作为《姚雪垠全集》编委，笔者趁便从姚海天先生处获得这份即将收入《姚雪垠全集》的《天京悲剧》上卷概要，先睹为快。阅读之后，对姚雪垠先生构想中的长篇历史小说《天京悲剧》有了大致了解，对有关问题也有了新的思考、新的认识。

在写出《天京悲剧》上卷概要13年后，与茅盾通信时，为便于茅盾了解《李自成》全书基本内容，姚雪垠又拿出“文革”前写出的71000字的《李自成》内容概要寄给茅公看。《天京悲剧》原计划写100余万字，后决定压缩一半。《李自成》全书约330万字，按概要与全书的比例，《天京悲剧》仅上卷概要即已达57000字，比《李自成》概要详细得多。确如作者在回忆录《学习追求五十年》中所说，两部书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同时酝酿构思的，“甚至可以说，关于反映太平天国历史的小说轮廓比反映明末历史的小说轮廓更为清晰”（《姚雪垠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我们从这不到60000字的概要，已可基本领略《天京悲剧》全书的大致风貌。

《天京悲剧》上卷概要是以书信体形式写的，共包括15封“信”。但第一封不知为何在交周勃保存前已遗失，目前所见为第二至第十五封。这14封“信”实际也就是上卷第二至十五章的基本内容（以下我们说第几章，对应的就是第几封“信”）。

读此概要，对比已经完成的小说《李自成》及其全书概要，笔者明白了作者为何当时没有先写《天京悲剧》而选择先写《李自成》。

据现在看到的内容概要，《天京悲剧》与《李自成》结构上明显不同。一是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叙述，故事单线发展，只在第十四章《恐慌的北京城》中暂时离开征战中的太平军，专述敌方清政府方面情况。这与《李自成》将明、清、李、张各方面情况分别展示的复线叙事及大开大合、横云断岭的结构方式迥异。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天京悲剧》主要聚焦于起义军方面，探讨反思太平天国运动的经验教训，而非全面描绘清晚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它不属于《李自成》那样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倘若全书写成，它会以历史与人性反思的深度取胜。如果说《李自成》是以讲起义军如何兴起为主（全书五卷占其四），那么，《天京悲剧》的重点在于探讨总结起义失败的教训。全书重点在下卷，这从书名即可判定，因为“悲剧”在下卷才开始展开。上卷实际是下卷的铺垫与埋伏。

在《李自成》中，姚雪垠曾总结过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例如忽略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忽略了清朝的力量与动向，忽略了招降吴三桂失败、吴与清兵勾结的巨大威胁，以及进北京后因腐败及措置失当而失去人心等。太平天国起义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与李自成起义有相同之处，又有其独特的地方。这里且说其独特之处：较之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而非以往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因为李自成要建立的是新的封建王朝，是与被他推翻的明王朝性质一样的王朝，而太平天国具有全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其所建构的政体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所未曾见。按其所提“天下凡间实为一家，男尽兄弟女尽姊妹”，“使乱世变为公平正直之世，共享太平”“无处不饱暖”的理念与理想，较之李自成“不纳粮”的号召，更细致、更系统、更有感召力。太平天国的革命既是政治的革命，也是社会的革命、文化的革命。它的思想理论资源来自西方，来自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督教文化。另一方面，“拜上帝会”又是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中国化，与原初意义上的西方基督教判然有别。按今天观点，太平天国起义严重冲击了地主阶级，具有阶级斗争特点；但太平军打的却是“斩除清妖”的国内民族斗争旗号。

《天京悲剧》上卷虽然写的是太平天国事业的上升时期，太平军优点一面表现更多，但在概要中姚雪垠已明确指出了其主要失误或历史局限。此时洪杨矛盾尚未显露，太平军上下团结一致，军纪严明，比较得底层百姓的人心，作者所揭示的太平军弱点或失误不在“内讧”，而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宗教意识形态宣传。《概要》指出：杨秀清和萧朝贵联名发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虽然“在革命初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毕竟不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传统信仰和习惯”，“特别是会引起知识分子的反感，失去了很多可能争取的人们到革命的阵营中来”。第十一章写到，闻听太平军即将到来，苏州方面代表去南京馈赠银两、表示投降，但“他在半路上听说太平军的宗教主张，使他很抵触，便写信回苏州，主张不去见太平军谈判了”。

第二，“平等”宣传与具体执行的自相矛盾。姚雪垠直言，想到这些时自己“心中是不大舒服的”。太平军“从一开始就宣扬了人人平等和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但从起义后就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诸王与其他人之间画了一道鸿沟”。建立女馆本为保护妇女免遭奸淫，但“后来主要目的变成了动员和强迫妇女参加战时劳役”；“太平天国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上放了异彩，从理论上肯定了男女平等”，“但诸王可以选许多妃子”。

第三，对旗人太不人道。尽管作者申明“不能拿今天的眼光看100年前的事情”，但还是批评或谴责太平军的狭隘民族观以及对满族普通人民人道主义精神的缺乏：一旦破城，对满人不分老幼男女一概屠杀。写到这些，作者联系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虽仍以排满相号召，但“不再进行残酷的民族报复，而提出民族的平等与共和”，认为是“大大地跨进一步”。他更肯定新中国“消灭了各民族间的隔阂、压迫和残杀，建立一个亲密团结的大家庭，这是多么幸福的大事！”不过，另一方面，姚雪垠也指出早期太平军除了对旗人报复性屠杀以外，“决不妄杀一人，就是对清朝官吏也不是一概都杀”，力图给太平军以客观公正评价。

《天京悲剧》上卷第十五章概要（第十五封信）写到南京攻克后太平天国诸王的入城式：“沿途居民奉令跪迎，不许仰视”，“洪秀全进入天王府以后不再出来了”。这预示着，在下卷中，天朝政府脱离人民、违背初期承诺的趋向将会被重点表现。可惜这下卷的概要未能写出。

姚雪垠在谈及《李自成》的写作时，多次强调写历史小说要“深入历史，跳出历史”，而深入研究历史是前提。这一点在《天京悲剧》概要中也有明显体现。作者多次强调对史料的辨析，他既不盲信旧时地主阶级文人所记录或纂集的史料，对解放后新的历史学家的论著也有分析、有批评。对封建文人的记述，姚雪垠考虑到其阶级偏见，摒除对太平军的污蔑成分；对解放后“十七年”时期新历史学家的观点，则指出其对太平军过于美化和理想化，认为其“强词夺理”，“不能叫人心服”。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教训，尚有需进一步研究讨论之处。《天京悲剧》上卷概要第十五章说“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当天京建立的初期就帮助反革命方面”，这虽有一定道理和依据，但还可作重要补充。据河南籍台湾史学家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在太平军进军南京途中及定都天京初期，英、法、美等国基本保持中立，甚至曾对太平军有所同情，因为他们认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毕竟源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如成为一基督教国家，可大有裨益于通商传教”，如果太平军成功，“中国亦可走上进步之途”。但他们与太平军接触时，东王杨秀清回复“尔远人愿为藩属，天下欢乐，天父、天兄亦欢乐。既忠心归顺，是以降旨尔头人及众兄弟，可随意来天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门，均不禁阻，以顺天意”，完全是“天下外国皆来降”的态度，显示出太平天国领导人极度的自大无知（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9页）。最后，西人中立一段时间后，改而明确支持清政府。这应该是属于太平天国在外交方面的失误与教训。笔者相信，倘若姚雪垠先生倾力写完《天京悲剧》的话，经过对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研究，这方面的内容也会表现出来，因为在《李自成》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作者正是不断发现新史料、深化自己历史观点并完善艺术构思的。

如前所述，读罢《天京悲剧》上卷概要，笔者对姚雪垠先生为何在已有更清晰构思的情况下没有选择先写《天京悲剧》而选择先写《李自成》，有了更深的理解。曾有人将这种选择解释为出于迎合毛泽东的考虑，这是对作者的曲解。作者自己的解释是：“第一……在五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刻地写出近代史上革命领袖的缺点和错误是不可能的。第二，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在南方，主要人物是两广籍，而我在地理上、风土上、生活上、语言上……都不熟悉。至于写《李自成》，这一切都不能成为障碍。”（《姚雪垠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这解释完全合乎情理：在“十七年”时期，关于可不可以写英雄人物缺点，当代文学界曾发生争论，最后的主流意见虽未明确说不许写英雄人物缺点，但写了缺点的作品都受到批判，被指为丑化英雄。这样，写英雄人物缺点实际上已不可能。古代、近代的英雄也不例外：当时的主流史观是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起义领袖都被视为革命英雄，当然也必须尽量高大完美、可为楷模。如此，以总结起义军失误与教训为主题的《天京悲剧》，当然无法面世！

同时，这也使得我们更理解了自《李自成》诞生起就被争议的一个问题，即为何该作前两卷特别突出李自成的优点而很少写其缺点。即使如此，由于姚雪垠坚持现实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写出了李自成的帝王思想和天命观，当年仍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责备。若将《天京悲剧》写成主要反思和揭露太平天国运动失误或缺点的作品，结果可想而知。而写《李自成》前两卷则既可避免上述问题，而又合乎情理：前四卷写的是李自成事业上升期，是其如何在逆境中坚持与奋起，展示这一阶段李自成的超人之处就显得合情合理；第三卷李自成开始暴露更多缺点与失误，而该卷出版已是改革开放时期了；第四、五卷出版时，历史反思已成主潮，史学和文学界对农民起义负面作用的强调渐成主流，而此时姚雪垠在小说最后两卷中既反思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也并未将李自成的敌对方写成小丑、甚至作为悲剧英雄来塑造，不会显得突兀。但姚雪垠仍认为李自成不失为失败的英雄，这又与世纪末主流有所不合，显示出姚雪垠的不同流俗。

据周勃回忆，在创作《李自成》第一卷时，姚雪垠曾于梦话中感叹张献忠难写（周勃：《姚雪垠下放东西湖琐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笔者认为，这是因张献忠在民间及史书记载中名声不好，作者不能不将其写成有明显缺点的英雄。还好当时有李自成作为完全正面的形象予以“矫正”。而《天京悲剧》中的主要人物洪秀全和杨秀清，都是缺点不亚于张献忠的起义领袖。而且，太平天国起义与现代革命更接近，缺点与失误处理起来更难。

《天京悲剧》概要与《李自成》的概要有所不同：《李自成》概要是在全书第一卷已经出版、第二卷也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写的，对于前两卷来说它是对于现成作品的压缩，因而能从中看出结构设置匠心与人物性格塑造。《天京悲剧》概要尽管较之《李自成》概要详细，但它毕竟只是作者在搜集辨析史料后理出的故事脉络或情节大致线索，是“深入历史”的结果。按照姚雪垠的美学思想，在正式创作小说时，他必定会再“跳出历史”，通过艺术想象，通过巧妙构思对情节结构进行精心设计，并着力塑造一系列性格鲜明并具有高度典型性的鲜活人物形象，展示出与《李自成》不同的别样风貌，给读者以不一样的艺术享受与思想启迪。因为姚雪垠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富于独创性的作家。可惜天不假年，《天京悲剧》终未写成，我们只能抱憾了。在作者原先的创作规划中，在《天京悲剧》完成后，他还要写辛亥革命题材的《大江流日夜》。倘若这三部作品都能如愿完成，读者看到的会是姚雪垠的“革命反思三部曲”，《李自成》的反思意义和价值也会被重新认识。1999年姚雪垠先生病逝后，了解《天京悲剧》写作计划的《李自成》第一卷责编江晓天感叹说：“姚雪垠先生带走了他心仪已久的《天京悲剧》，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

值得警惕的学术机制碎片化

□牛学智

学术的碎片化，我特指人文研究的碎片化，即学术研究上把研究对象不断降级分解分层，乃至于粉碎到原子化、单子化为止的行为。就像面对一只碗，因为前人已经定位成吃饭的工具，后来的人面对同样的器皿，就不再谈碗随时代变化而派生的新的文化和价值功能了，只盯着碗釉之上的细密纹路和颜料的成分，以自我感觉为中心没完没了去撰写秘传趣味。其结果是，洋洋洒洒几十页几百页过去了，读者却只能在一堆颜料的海洋与一片茫茫然的瓷片天空望碗兴叹，因为读者面对的已经不再是具体的碗，而是碗的一个分子或一个原子、单子。总之，把完整对象粉碎成细末，是碎片化的终极追求。

当然，系统论述人文学术碎片化的历史源头及其始作俑者，当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和富里迪的《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两本书。前者从社会进化的角度指出，人作为主体如果不能以康德所说自觉使用自己理性来干预日趋消费化的社会运行，那么，人迟早有一天会变成自己的消费品而宣告人本身的终结，建构意义生活、价值生活所需人的完整视野，也必将消失。后者致力于人文知识分子——这个曾经以塑造人类价值生活蓝图为志业的群体为观察对象，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这个群体对汹涌而来的项目经纪人化或所谓专家主宰的世界碌碌无为，那么，当他们舒舒服服变成小技术官僚的那一天到来时，非但人的完整视野没有了，而且会连同自己的主体性及看待对象世界的心情也都荡然无存了，可想而知，剩下的只是被消费过或被无端弃置一边的所谓知识渣滓。

前面说这么多，我想指出的现象是，某种机制不让该看见的人看见，或者不愿让看得见的人去注目，因为他们把发现机制视为陈旧的、不合时宜的命题，自然不能算创新。这结论自然不是我的一己私见，早在2016年华中师范大学的徐勇就已敏感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徐勇是在《破解项目体制造成的学术“碎片化”问题》一文中，并没有剑拔弩张地批评某个具体学者的具体学术问题，而是将眼光移向造成如此学术现实的机制和社会大背景。他认为项目体制是导致学术研究碎片化的最突出现象。首先，项目经费额度将学者切割成孤立的个体。在我国，每年的项目都有一定的经费额度。从文科来看，即使是重大项目也不到100万元。这些钱对于某种个人研究来说，不算少；但对于一些具有学术文化工程类的研究来说，就太少了。除极其个别的情况以外，现有的项目体制将学者切割成一个个学术格局“小气”的原子化的个人。每个人都在为一笔笔小小的经费奔波劳碌，经费总量虽少，但对于个人来讲却十分重要，也导致难有重大学术文化工程成果的产出。

其次，项目管理体制造成重复和浪费。近些年，我国的社会科学发展迅速，项目日益增多。在社会科学项目设计中，绝大多数都会将调查作为重要方法，调查在项目经费预算中占有较大比重。但每个项目的调查是互不关联的。换言之，每个项目投入的调查经费对于其他人的调查，甚至对本人今后的调查都不会产生持续价值。因为学者完成一个项目后，又会根据项目指南去获得新的，甚至与原有项目毫不相关的项目。于是又会产生新的调查及其经费，如此循环往复。

徐勇关注的是社会学和经济学，多为现实应用对策研究。可是，这样的机制一旦形成并且富有操作性，便是普遍的和意识形态性质的了，自然波及到广义的人文基础研究领域。最突出的表现是学术的等级化，重大的和面子上的研究似乎只配位居中心的、终评委级别的学者所分享，分摊给基层的、边缘地区学者的，也就只能是边角料、下酒菜，即是说，想要让研究有出头之日，只能进入此等机制运行轨道，别无选择，只好往边缘、往犄角旮旯、往生冷怪僻的方向走，甚至不成文规定是，越小、越碎、越不起眼、越不被人注意，便越有价值。很显然，在如此逻辑中，对象的价值、意义已经完全不重要了，真正重要的是你做得是否足够小、足够冷僻、足够闻所未闻，哪怕翻出早已被现代知识分子扔到历史垃圾桶里的玩意儿，只要终极评审不曾听说过，就可以堂而皇之被赐予创新之桂冠，紧接着它也就成了学术生产流水线上一个绕不过去的环节。

如此怪诞逻辑，可想而知，我们若假以“将来”来审视，要么留下的是一堆谁也不懂更遑论谁还能用得着的学术垃圾，要么被强行镌刻在学术史显赫位置的是终极把关者所青睐的来自教科书末端的“赘余”。

我无意于诋毁项目化学术，也无意于去破坏终极把关者的好心情。只是行道在此多年，切身体会实在太多。当你激情满满去申报“正面的”“重要的”“基本的”议题时，你突然被告知，这问题不该你关注；当你仓皇应战，撺掇一些根本没有任何积累的散乱段落，本着中彩票的心态一试时，你却中彩了。更有胜者，当你信心满满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蹑手蹑脚呈报一沓心得体会想博得同行认可时，你碰到的只是一鼻子灰；而当你以顽主的谐谑拼凑一些炙手可热的关键词时，你却忽忽悠悠蹬上了学术的船。

总之，碎片化其实并非个人所愿有，而是背后操盘手在掌控。既如此，与其没完没了指责学者个人的学术碎片化，不如质问隐身于学术后台、神龙见首不见尾，却大步也不迈出学院高墙、一头栽进学科教科书陷阱的碎片化学术评价机制。我向不以最坏的心思揣度担纲民族学术大任的学者的狭隘心胸，但事实一再证明，至少部分担纲大任的学者以自家一亩三分地为尺度所构成的学术机制，其实正是人文学术研究日趋碎片化的真正推手。他们总自信地认为学术就是“学”和“术”，无关价值判断，也无关意义建构。如果真是那样，进任何一座图书馆随便翻翻即可，既温习了知识，也陶冶了情操，还要现在的学术干什么？

当下人文学术的首要任务，当然不是给无限小下去的个体化趣味赋形，也不是全无底线地撰写和铭记边边角角、奇奇怪怪的“知识”和“经验”，而是重新建构新时代的整体性和新时代人们普遍的价值诉求。既如此，打破使学术评价机制碎片化的惟一办法，只能是最大限度释放民间学术诉求并使之自由多元地进入学术体制，那么，就有必要叫停高墙之内少数几个话语权执掌者的裁决，让学术的终端成果代替“指南”式的私人订制，如此，才能激活死寂的表面却好像又是“多元化”的碎片化学术现状，完整的人的形象和完整的社会结构，才能回到正常的学术观照平台，福柯意义的解构主义方可回到它的本意——去掉知识的无用无效，唤回新时代应有的新感知和新体验。

广 告

《中国作家书系》
图书出版征稿

南京远东书局成立20年来，组编的《中国作家书系》、《当代艺术家作品集》等系列图书，以正版品牌的法律保证，赢得了海内外作者的长期信赖。

凡文学、社科、年鉴、方志、家谱及书画摄影等作品均在征稿范围。使用国内正版书号，每本书均有独立CIP数据号，可在“中央宣传部出版物数据中心”官网验证。编辑部将对出版的作品，认真编排校对，精心设计策划。本着发展项目、扶持作者的精神，多年来，南京远东书局代为出版策划的图书出版质量和艺术品质有口皆碑。

图书出版后，将安排在国内知名媒体发布新书讯。优秀作品本书局可代办发行，并推荐参加各类图书奖。

联系地址：210022南京市将军大道20号中惠国际大厦9座5楼 南京远东书局编辑部

投稿信箱：yd368@126.com QQ：85648588

出版热线：025-51939999、52103958

（征稿信息长期有效）

小说评论 二〇二〇年第五期要目

文坛纵横 三体人的惶恐与“真”的辩证法——关于现实主义的思考之五 … 李松睿
人学是文学：人工智能写作与算法治理 … 黄平
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评论小辑 贾平凹长篇小说《暂坐》访谈 … 贾平凹 韩鲁华
异托邦叙事中的现代空间焦虑 … 李遇春
以散文化的方式抒发人生感慨 … 贺绍俊
阳光摇曳于别样女性生命样态的叙写 … 刘华阳 韩鲁华
众生杂语 暂坐“谜”中 … 韩伟 胡亚蓉
莫言研究 莫言的茂腔叙事及声音诗学 … 张闳
双重的争议与经典化：“世界中”的《红高粱》 … 刘江凯
小说家档案·路内专辑 主持人的话 … 於可训
在自觉与使命中前行——访谈录 … 王琨 路内
重拾一种被拆散的个人经验——自述 … 路内
路内小说创作论 … 王琨
小说作家作品研究 一系列神态各异的乡村怪人——读《桐城往事》有感 … 邬元宝
历史情境的还原与哲学家老子形象的文学呈现 … 栾梅健
“现实的理想，行动者的梦”——韩少功与1990年代的文学坐标 … 项静
小题材的大品格—论铁凝的《小嘴不停》 … 李浩
《野葫芦引》的话语时间及与《火》的比较 … 何英
陕西文学研究 “人民性”书写的根基与精神指向
——陕西文学七十年的追求与回望 … 于敏 赵学勇
论周瑄璞的生命力书写 … 窦鹏

近来，有关单位和读者反映，有人冒用本刊名义征集稿件。本刊声明如下：
1.本刊未设立其他采编点或分支机构，也未委托任何单位或个人编辑出版《小说评论》杂志。
2.本刊唯一办公地为西安市建国路83号，联系电话为029—87428615，87428476。
3.本刊投稿信箱更改为xspl1985@vip.163.com，原xspl1985@163.com邮箱作废。
4.本刊对冒用本刊名义进行收费和征集稿件的单位和个人将保留起诉权利。
敬请广大作者和读者注意，谨防上当受骗。本刊将依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宁夏文联主管主办 朔方 2020年第九期要目
邮发代号：74-2

<table>
<tr><td>开卷</td><td>你的人物就是你自己（访谈） … 付秀莹</td><td>赵依</td></tr>
<tr><td>中篇小说</td><td>向晚有落日 …</td><td>薛喜君</td></tr>
<tr><td>短篇小说</td><td>长在屋子里的树 …</td><td>唐慧琴</td></tr>
<tr><td></td><td>快乐12 …</td><td>冯伟</td></tr>
<tr><td></td><td>树叶飘落的时候 …</td><td>郭乔</td></tr>
<tr><td></td><td>看不见的村庄 …</td><td>焦红琳</td></tr>
<tr><td></td><td>六只喜鹊 …</td><td>孙海翔</td></tr>
<tr><td>悦读</td><td>在布拉格读卡夫卡</td><td>行超</td></tr>
<tr><td>实录</td><td>治淮工地上的父亲 …</td><td>吴光辉</td></tr>
<tr><td>散文随笔</td><td>散文二题 …</td><td>雍措</td></tr>
<tr><td></td><td>神秘通道 …</td><td>吴安钦</td></tr>
<tr><td></td><td>遇见河西宝卷 …</td><td>李妍</td></tr>
<tr><td></td><td>县城的若干片段（三篇） …</td><td>刘星元</td></tr>
<tr><td></td><td>家在王石窑 …</td><td>王永利</td></tr>
<tr><td></td><td>母亲二题 …</td><td>杨亚雄</td></tr>
<tr><td></td><td>一个人的春节 …</td><td>包作军</td></tr>
<tr><td></td><td>短文三则 …</td><td>张强</td></tr>
<tr><td></td><td>忘年交（外一篇） …</td><td>康锐</td></tr>
<tr><td>诗歌</td><td>回首宁夏（组诗） …</td><td>谢克强</td></tr>
<tr><td></td><td>人间背影（组诗） …</td><td>王若冰</td></tr>
<tr><td></td><td>仰望（组诗） …</td><td>蓝雁</td></tr>
<tr><td></td><td>母语（组诗） …</td><td>阿赛</td></tr>
<tr><td></td><td>体内微小的细线（组诗） …</td><td>董喜阳</td></tr>
<tr><td></td><td>叙述（组诗） …</td><td>王金林</td></tr>
<tr><td>译作</td><td>小说二题 …</td><td>刘宪平译</td></tr>
<tr><td>诗词</td><td>诗词十七首… 宗西 贾来发 贾志中</td><td>潘万虎</td></tr>
</table>

地址：750002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北京中路57号信通大厦26层
月定价：10.00元 电话：0951—5166181

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
2020年第十期 邮发代号：82-106
第一时间畅读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佳作

《北京文学》70华诞经典回顾
零作坊 … 迟子建
一次抒情变奏——重读迟子建的《零作坊》（评论）… 张燕玲

中篇小说排行榜
森中有林 … 郑执
桃之夭夭 … 姚鄂梅
长夜 … 李凤群
一次失业 … 君婷

本刊每期内文208页，全部彩色印刷，装帧精美，每册定价15.00元，全年12期定价180.00元，且每期随刊赠送精美副刊。本刊2021年杂志开始征订，定价不变，请读者们及时订阅，读者可到当地邮局订阅本刊，也可到《北京文学》微店或杂志铺（http://www.zazhipu.com）订阅或购买本刊。本刊国内邮发代号：82-106。国外邮发代号：M1780。地址：100031，北京前门西大街97号北京文学月刊社发行部。电话：010-66031108/66076061。